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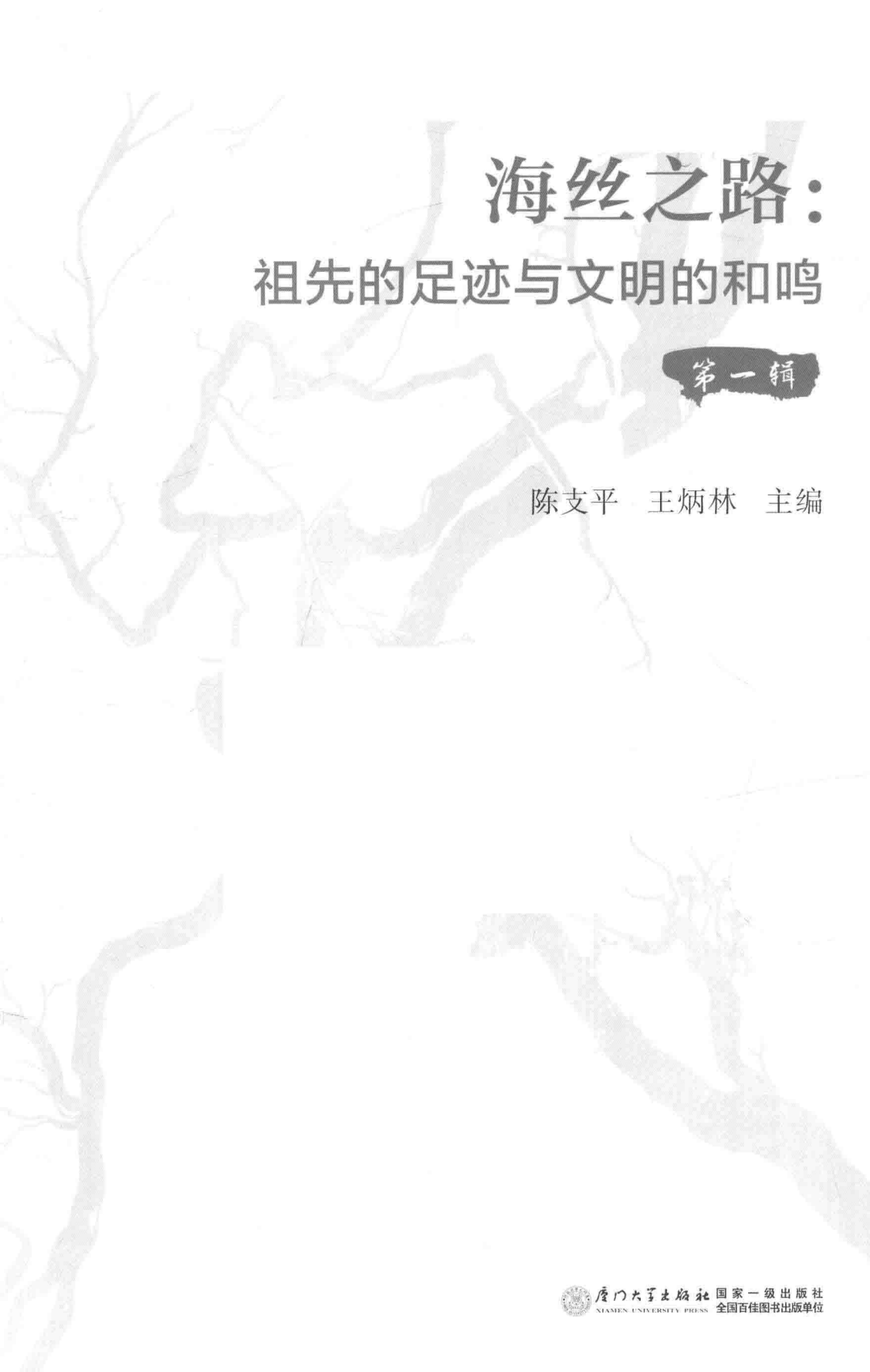
陈支平 王炳林 主编

海丝之路： 祖先的足迹与文明的和鸣

第一辑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海丝之路： 祖先的足迹与文明的和鸣

第一辑

陈支平 王炳林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丝之路:祖先的足迹与文明的和鸣.第一辑/陈支平,王炳林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15-6918-4

I. ①海… II. ①陈…②王…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中国-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5071 号

出版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薛鹏志 章木良
封面设计 李嘉彬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 mm×1 000 mm 1/16
印张 30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序 言

陈支平

“以海为田”，是数千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沿海地区人民赖以繁衍生息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以海为田”的生活方式，造就了闻名世界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是曲折艰难的，同时也是灿烂辉煌的。祖先的足迹追逐着大海的波涛而“梯航万国”，它既充满着泪水，又充满着欢乐。泪水与欢乐的交织，促成了不同地域间文明的和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向外延伸，同时也是不同区域间社会与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是以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为核心而逐渐向海外扩展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状态下，无论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还是世界上其他具有航海传统的地区，如地中海地区等，其从事海洋活动的能力和范围，都受到一定的限制。从中国的上古时期以迄宋元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动内涵及其范围，更多的是局限在东南亚地区一带，并且直接或间接地抵达波斯湾中东区域。特别是到了南宋与元朝时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以连接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地及阿拉伯世界为显著特征的。尽管如此，宋元时期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亚洲的地域之内。

但是到了15世纪之后，即明代中期开始，世界格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欧洲人，开始向世界的东方进发，“大航海时代”已经形成。这就使得15世纪之后的中国社会，被拉进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史”的国际格局之中。从比较世界史的立场来观察，明初中国国力的鼎盛时期，正是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西方透出资本主义的曙

光,和明中叶以降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潮的新旧交替的冲动几乎同时。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步步推进,早期殖民主义者跨越大海,来到了亚洲的沿海,并试图打开中国的社会经济大门,谋取原始积累上的最大利润。差不多在同样的时期,伴随着明代中期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人们也开始突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犯禁走出国门,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15—17世纪,固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世界各地扩展的时期,从而逐渐推进了“世界史”的涵盖空间;但是其时东方的明代社会,中国的商民们同样以积极进取应对的姿态,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向海外延伸进展。这种双向碰撞交融的历史进程,无疑在另一个源头促进了“世界史”大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因此可以说,15—17世纪的中国社会及其海上丝绸之路,同样是推进“世界史”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15—17世纪中国社会经济激烈变动及其与早期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碰撞过程中,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态势。虽然说,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可以追溯到汉唐时期;但是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主要局限在亚洲的相邻国家,对于欧洲等西方国家的影响,极其间接且相对薄弱。到了明代中后期,情景就不一样了。双方不仅在贸易经济上产生了直接并且带有一定对抗性的交往,而且由于西方大批耶稣会士的东来,在文化领域也产生了直接的交往。这批西方耶稣会士们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很少有人用轻视的眼光来对待中国文化。由于有了这种较为平等的文化比较心态,明代后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们,在一部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协助下,开始较为系统地从事向欧洲译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先驱利玛窦所撰《中国札记》以丰富的资料,向西方“开启了一个新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在这种较为平等心态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中,中国的文化在西方受到了应有的尊重。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与推崇,至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而达到高潮。然而到了18世纪之后,由于欧洲中心论的确立,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大大下降。

此外,15—17世纪中国沿海商民突破传统经济格局和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犯禁走出国门,投身到海上贸易的浪潮之中。随着这种碰撞交融的深化,中国的对外移民也形成了一种常态的趋向。这种带有家族、乡族连带关系的海外移民,必然促使他们在海外新的聚居地,较多地保留着祖家的生活

方式。于是,家族聚居、乡族聚居的延续,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风尚习俗与方言的保存,文化教育与艺能娱乐偏好的追求,都随着一代又一代移民的言传身教,艰难存继,而维系着顽强的生命力。

明清以来这种由民间传播于海外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传播,逐渐在海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象征。因此,我们在回顾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文化在明代后期向西方传播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明代中后期以来一般民众生活方式即民间文化对外传播的文化作用及其意义。而这两种不同途径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流、渗透与和鸣。

当我们今天回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光辉历程的时候,切不可忘记我们的祖先在汹涌的波涛之间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也不可忘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在社会经济往来与文化交往中的相互排斥、相互抵制和相互吸收的种种曲折历程。正因为如此,我们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省的学者们,有责任、有义务对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涵盖空间、不同的内容实质、不同的文化思考,进行多视野、多层次的考察研究,并且从中提炼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切不可人云亦云,把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变成一个时髦的口号,连连高呼!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联络了国内外的一批有着共同志向的热心于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们,每年不定期地举办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及海洋文明的学术研讨会,针对各自最新的研究心得,在研讨会上相互交流、相互切磋,以期有所进步,有所提升,从而能够为我们国家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某些历史文化方面的借鉴。

本次所结集出版的论文,是2017年5月12—14日在厦门市筭筭书院学术中心举办的“中国与世界:多元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上发布的。研讨会由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主办。我们把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定名为《海丝之路:祖先的足迹与文明的和鸣》第一辑。

目 录

当代海丝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的思考	陈 耕/1
世界海洋文明的地域差异与对接	
——杨国桢教授对中国海洋史的深邃思索	王日根/11
妈祖信仰的社会基础与世界文化意义	陈支平/17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通”:当代新加坡华人	
社会文化研究	曾 玲/29
16 世纪西方经验中的妈祖信仰与明代海上丝绸之路	刘婷玉/41
论印度“珍珠链战略”臆想与中国“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构想	符明秋 张 杰/55
民间文化与现代化	
——晋江围头妈祖宫的个案研究	范正义/68
大航海时代下的荷兰对台宗教殖民	施沛琳/81
金门环境变迁与海丝文化之探讨	吴启腾/93
五口通商下金门“落番”发展探讨	蔡容英/103
西域人与元朝中西海上交通的拓展	马建春/119
福建的海洋发展、海外移民与海上丝绸之路	曾少聪/141
清季中西医学文化交流与冲突	
——基于《海关医报》分析	佳宏伟/152
晚清新加坡闽籍商人的兴学活动与儒学传播	
——以陈金声、邱菽园、林文庆为中心	李毅婷/179
清代中外贸易中的南京布	范金民/194
从“瘴乡”到“都会”:“海丝”视阈下郁林州历史流变考略	宋永忠/226

神权与皇权的结合：清代台湾妈祖庙与地方社会治理·····	赵庆华/241
略论宋元以来闽南海商形象的塑造·····	庄小芳/255
万德华神父笔下的传教经历：海峡两岸的观察记录·····	吴蕙芳/269
闽浙台岛屿渔民迁移的宗教观察	
——以福建同安西柯村一支为例·····	安嘉芳/293
抗日英雄严秀峰与台湾少年团·····	卞凤奎/327
明代初期的岛屿治理议题：以《明实录》为中心·····	黄丽生/365
论《全唐诗》中“题海诗”的共相与异彩·····	吴智雄/383
南宋诗对北宋诗海洋书写新兴主题的承与变	
——以“海民关怀”“海洋贸易”“海洋生活”为考察·····	颜智英/407
《王文成浮海传略》考·····	杨正显/428
战乱威胁与炮舰政策：北洋军阀统治后期英国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武力介入问题·····	应俊豪/446

方模式办的大学的学科体系当然照搬西方的学科体系。

第二阶段为 1949—1979 年。

背景是冷战、美苏对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于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成为学术的主流；另一方面，经济学变成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被边缘化，到“文革”时甚至被取缔。“文革”中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要成为第三世界的领头羊，打倒帝、修、反，大学停办，学术基本停顿。

第三阶段为 1979—2009 年。

背景是冷战结束，“文革”结束，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于是，改革开放，改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与世界对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各种各样的学科恢复设立，各种各样的学派进入大学。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世界震荡，也使中国人认识到完全按美国资本主义那套是不行的。

仔细观察这三个阶段大学学科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每一种文化进来都要夺取自己的话语权，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种话语体系的建立，依托于与其相应的学术体系；学术体系的建立则建基于学科体系和教学体系。

20 世纪 50 年代，学院合并，学科合并，大学里面像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会计学，很多都消失了，多是学苏联的社会经济学，生物学也学的是米丘林的学说。1979 年以后，西方欧美的学科就开始恢复了，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会计学等。

一百年来的学习，无论哪个阶段，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都是必不可少的，都帮我们开了眼界，给了我们宝贵的知识、智慧，培育出一代代越来越出色的中国人。我们永远都要“美人之美”，向他者文化学习。

但是，我们这一百年，逐渐发现中国的事，照搬照套别人，不管是苏联社会主义还是美国资本主义都不行。我们还需要“各美其美”，向我们自己的传统学习，向有五千年积淀的中华文化学习，推动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于是，就有了三个“前所未有”。

二、中共十八大以后的三个“前所未有”

第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重视前所未有。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宣部副部长王世明来厦,专门阐述“必须立足”四个字,就是“不二选择”。这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怎么现在必须立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呢?

“文革”“批林批孔”,“孔老二”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代表。到了2014年,习总书记去了孔庙;并在2014年世界儒学大会上做长篇讲话,高度评价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2016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两办专门发文《关于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详细布置了7项传承发展的任务。

第二,对世界发展、全球治理的重视前所未有。

中共十八大以前,全球治理在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只是被视为大的时代背景。十八大之后,我国明确提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最近两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为内容的多次集体学习,更把全球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2013年,习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等理念。

2014年,习总书记在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宣示中国的文化理念: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融合的。

这个理念和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表现出作为全球化推动者的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兴起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全球化最有力、最重要的推动者。全球治理正是保证全球化有序健康发

展的重要保障。它已成为当代中国两个大局中国际大局的关键，统领着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是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各种战略的基石与轴心。

很多人都孤立地看待“一带一路”，没有注意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物品”。

中国全球治理的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充分体现平等、协商、互利共赢，有效促进人类共同利益、地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共赢。“一带一路”不能为中国独有，不能只关注中国国家利益。“一带一路”具有更多的公共性，无论是作为一种机制，还是框架，它都是开放的，提供了一个合作共赢的理念、机制、平台，以促进全球问题的解决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争取对全球治理做出特殊贡献，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新的理念去引领全球治理。这个新的理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个特殊的贡献就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着力去践行。

这些也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对创新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重视、要求前所未有的。

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三个前所未有，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从“两个凡是”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历史转变，一个伟大的转折。我们今天正面临如何继承和推动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问题。

三个“前所未有”体现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对全球发展的担当。“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体现出中国对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公平公正发展的深谋远虑和高瞻远瞩，体现出从孙中山“天下大同”到毛泽东“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抱负与理想。

三个“前所未有”还体现出中国正在从“向西方学习”，转变为同时也“向传统学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独立，首先是政治独立，其次要经济独立，最后还要有文化的独立，要解决挨骂的问题。现在我们在世界舆论上，正如习总书记说的，“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争取话语权，让中

华文化真正独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就必须有习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三个“前所未有”,是要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化,重新思考如何建设中国的话语体系。没有中国的学科体系,就没有中国的学术体系;没有中国的学术体系,就没有中国的话语体系。

三个“前所未有”,正是我们开展当代海丝文化研究必须深入思考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

三、四个“找不到”——学科、标准、概念、方法

当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有四个“找不到”:找不到学科、找不到标准、找不到概念、找不到方法。

(一)找不到学科

找不到学科,这是当前从中国问题出发的新的学术研究都会碰到的大问题。

国学找不到学科,只有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大学中文系读《诗经》《论语》《史记》;中国哲学系,又是《诗经》《论语》《史记》;历史系还是《诗经》《论语》《史记》。我们的国学本来是文史哲不分,现在被西方的三个学科切割开来,“三家分晋”。

有的同志说,岂止“三家分晋”!历史学分成各种断代史,简直是“碎尸万段”,“今不知古,古不知今”。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有专家无大师”。在学科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抛弃了自己的传统。现在是用西方的学科标准来设计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

不仅仅国学,中国戏曲也是如此。

过去讲中西戏曲的比较,一个是纯粹,一个是综合。西方的话剧,不能唱歌,是写实主义的,跟生活一样。西方的歌剧,连“你吃饭了吗”都要用唱的,不能用讲的。舞剧《吉赛尔》里面有大量的哑剧表演,不能开口讲话,也不能唱歌,必须用哑剧的舞蹈动作来表达。这就叫讲究艺术的纯粹;而中国戏曲“唱念做打”,是综合的。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学习西方,设立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则让各省市自己去办中等职业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成立则是比较晚的事。

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去一看,傻眼了,西方流行的是音乐剧。原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戏剧开始学东方戏剧,包括印度的歌舞、日本的能剧、中国的戏曲。他们创造了又说又唱又跳的音乐剧,是“唱念做打”综合的。一只《猫》演了几十年,演遍全世界,大受观众欢迎。于是我们又要学西方音乐剧,翻个筋斗。

更典型的是中医。中医视人体为一个系统,强调系统的调和平衡。现在到中医院,按西医分五官科、呼吸科、消化科等等,不仅是“三家分晋”,可以说是“五马分尸”。中西医是这样结合的吗?

还有中国美术,本应是诗书画一体,现在呢?

当然,西方学科分类方法有科学的宝贵的东西,对我们一百多年来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可谓居功阙伟,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不断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世界上就只有这一种方法吗?我们自己就没有别的方法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好东西,完全用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来设计我们的大学,怎么能学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呢?我们原来的大师,都是文史哲贯通;“三家分晋”,基本消灭了文史哲贯通的人才。

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此是一个整体。

这样的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唱念做打”不是孤立的,“望闻问切”不是孤立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中国文化的综合性、系统性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西方的学科分类当然也是源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大学设置的西方学科系统很纯粹、很单一。但是,这种学科系统培养出来的学生还能传承中国的思维方式、学术理念吗?这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间的事情是变动

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就是事物的平衡。事物的平衡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所谓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只要有常识的人,都了解事物的平衡只有相对平衡、动态平衡。

近一百年来,我们学习西方,按照西方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但现在西方的学术界,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也开始关注整体、系统、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个体差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这个变动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中国的戏曲、中医、国学、方志等等都是综合系统的。我们丢掉的不仅仅是中国学科,更有几千年来积淀的综合性、系统性的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方式。即使没有西方学术界的这一变动,丢掉中国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也是需要我们好好反思的。

当然,找不到学科的原因,不能赖别人,首先是我们自己缺乏“中学”学科体系建设意识,缺乏学科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不是大学学科的建立,那是教育部的事,而且大学学科的建立只能是在学科建设理论成熟之后。

今天我们开展多元视野下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讨、海丝文化研究,必须要有学科的意识。在当今时代和学术背景下,这个学科应当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当深刻思考,如何回应当今的时代和学术。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学术,这是我们前面三个“三十年”已经印证了的观点。

(二)找不到标准

中国的地方学离不开宗族文化研究,而宗族文化研究总要碰到族谱研究。在闽南文化研究中,很多历史学家批判闽南的族谱里面有许多假冒的祖先,不是名门,就是望族,一查都是假的。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一些是假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历史事实是不容忽视的:一千年来,闽南(甚至全中国)秦姓人没有一个会说自己的祖宗是秦桧,而姓岳的大多称自己的祖宗是岳飞。这听起来难以置信,但却是一千年来的历史事实。

我们骂秦桧断子绝孙,其实他的后代是很多的。可是,不到三代,他的子孙都不敢、都不愿认他,因为他做了大汉奸。“当汉奸断子绝孙”,这是中

国人的常识。

从历史学的角度讲这里有假，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说是抑恶扬善，通过抑恶扬善来推动文化、人性的正向发展，来引导人们向上、向善。

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运用多重史料，尽可能做到真实准确地还原历史；而中国文化在价值理念上，则更注重宣扬人性善的一面，人为地避开或者否定丑恶的一面。对中国人来说，文化不是小零碎，而是“以文化人”，是在教子孙后代如何做人。

历史学的结论并没有错，文化学者和民间百姓的理念也没有错。不是要相互指责，而是要有多学科视角的思考意识。一个强调真、一个强调善，难道就不能相互包容吗？又如何得以相互包容呢？这才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如何构建当代综合性学科的标准。

我们的中医，包括药、术、人三个部分，但是统一为一体的。药有药的标准，术有术的标准，人有人的标准。统一在一起，医者仁心是标准。

中国武术，流派五花八门，但有基本一致的武德标准。

中国戏曲，现今就有 360 多个剧种，古往今来各种流派更不计其数，但有基本一致的戏德标准。

海丝文化研究是多学科参与的综合性、系统性的人文学科，标准是什么？人文学科的标准是否就是价值取向、价值体系？

价值体系的建设是学科体系建设的核心。海丝文化研究不是各地各种海丝现象、数据和知识的罗列，同样要从海丝文化所展现的价值取向着手，构建自己的标准体系。

早期西方大学都从神学院开始，后来学校和教堂成了两条腿。但是在西方两条腿是统一的，学生不仅要上学校，也必须上教堂。我们自己文化的传承体系，从孔夫子开始就是德智体一体学习传承。这一百年来学西方，我们自己的体系被抛弃了；学人家，又只学了一条腿。只有两条腿才能走路，知识和做人，缺一不可。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构建，取决于中国学科价值体系、标准体系的确立。

（三）找不到概念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是该学科沿着共同的逻辑顺序，在两个方面的深化和展开：一方面是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和扩展，另一方面是该学科自

身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反过来指导前者。学科的理论建设离不开具体研究对象的增加和扩展,但是离开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揭示事物的实质及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学科理论的建设,首先是学科独特的概念体系的构建。如闽南学学科的建设首先要厘清闽南、闽南人、闽南文化、闽南文化区域等基本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门学问能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否稳定明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从西方引进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有的是被系统地阐释过,有的则是长期以来相沿成习、约定俗成的,它们都具有稳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指代。这一点必须向西方学习。

中国话语有两个层面的指谓:一是一套中国独有的概念体系,二是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的内在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一要有引人的故事,二要有生动的表达。概念体系是表达形式,内在精神是思想实质、价值取向。二者共同形成中国话语,缺一不可。

当然,多学科综合的标准,不是短时间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问题。完全正确一致的概念不可能立等可取,甚至由于文化本身的本地创新发展,可能永远都难以达成一致。它就像真理,我们各自从不同角度认识它、追求它、逼近它,但永远没有终极。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正是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交流,才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不断推动学术的发展。“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

(四)找不到方法

西方成熟的学科总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构筑通向学科目标的独特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综合性学科,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要寻找到独特的研究方法。像我们今天各个不同学科的朋友一起来进行共同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研究同一个问题,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方法。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所启发我们的定时定点的主题论坛,有可能成为综合性、系统性学科研究的一种方法。

以海丝研究为主题的相关课题,组织多学科参与的课题组,一起开展田野调查,一起梳理相关的资料,一起探讨共同的命题,或许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

多视角、多学科的海丝研究,如何寻找系统、综合、一加一大于一的方法、路径来实现中国风格学科的建立,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四、结 论

问题是前进的导向。四个“找不到”,正是我们的起点,是引领我们走向未来的第一个台阶。

学术研讨不是要统一思想,恰恰相反,是要激荡思想,撞击出火花。希望对于当代海丝文化研究的一点粗浅思考,能成为各位先进批评的靶标。